

在场主义文学研究·周闻道主持

生命的“在场”与美学的“主义”

——兼及在场主义为何钟情于散文

范 藻

摘 要：2008年兴起的在场主义散文写作，已取得不俗成绩并产生较大影响，学界虽然已从文学甚至哲学上予以阐释，但依然缺乏理论的总结提炼。此外，在场主义有着广泛的文学艺术针对性，但它为何钟情于散文，更是一个未曾涉及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为此，在论证生命即“在场”的本真性、美学为“主义”的理论性、文学乃“介入”的在场性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借助生命美学来破解在场主义的奥秘：其不仅表现出作家在场、介入、敞亮的“自由生命精神”，而且彰显了人类求真、向善、爱美的“自由生命追求”。

关键词：在场主义；散文写作；生命美学

2008年的中国文坛先后发生了两件事：“在场主义”文学理论旗帜的亮出和“抗震救灾”文学创作潮流的高涨，后者火爆异常后逐渐淡出人们视线，前者惊艳亮相后依然活跃于当下文坛。2008年3月8日，在四川“三苏故里”眉山，周闻道、周伦佑等19位作家在“天涯社区—散文天下”集体发表《散文：在场主义宣言》，文章开篇说道：

我们在散文的优美中相识，我们因散文的忧患而接近。我们通过“在场主义”的命名，使我们的美学主张汇聚、升华，并作为宣言式呈现。^①

那么，何谓“在场主义”呢？文章进一步指出：

在场主义以“在场性”的在场作为流派的哲学本体论建构；以“散文性”的在场作为流派的散文本体论建构；以介入——然后在场作为流派的写作方法论建构。^②

十八年过去了，这一流派共公开出版在场主义散文或散文集20余部，举办6届全国性的在场主义散文创作大奖评选暨相关主题论坛，以及近20次作品研讨会，《文艺评论》《文艺争鸣》《东吴学术》和《文学报》《文艺报》等学术刊物和权威报纸也推出了相关研究成果，

①② 周闻道主编：《颠覆城堡·理论卷》，第2、1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如《东吴学术》刊发15篇论文、《文学报》刊载20篇评论,孙绍振、陈剑晖、范培松、唐小林等著名学者也先后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孙绍振在2011年第3期《文艺争鸣》发文,称在场主义的兴起为“一个在散文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①。透过这个“重大事件”,我们惊讶地感到:散文,是当代中国作家自认为得心应手的创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散文,是当代中国文坛早已司空见惯的文体,遭遇了毫不留情的质疑。

有挑战必有突出重围的机遇,有质疑就会带来新的思考。那么,就在场主义散文研究而言,仅回顾它颇有成效的散文创作是不够的,仅总结出可持续发展的文学思路也是不够的,其亟须的是建构起在场主义散文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正如恩格斯曾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我们不得不说,在场主义散文仅有不断地推出新作、仅有连续性地评奖、仅有一般性地评论是不够的,其更需理论的指导和引领。事实上,在2014年,经历了五届评奖后,著名散文理论家范培松教授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场主义散文面临的三个理论问题”,并指陈“当务之急,在我看来,在场主义散文理论建设显得尤为突出了”。^③的确,在场主义散文需要存在论的哲学反思,也需要创造论的文学理论,但它更期待并呼唤着意义论的美学——追寻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彰显人的生命创造价值的生命美学的莅临。

让生命美学理论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为在场主义散文展开理论赋能。

一、生命即“在场”的本真性

这个先有散文“主义”宣言,后有散文“在场”创作的文学流派,本身就是一群文学人不安于生命之现状所躁动流露出的不满情绪、所表现出的不懈追求、所挥洒出的不灭激情,并予以“在场”的释放。可见,“在场”即生命,生命即“在场”,不论是生命还是“在场”,以及其文学表现,都不可能是凌空蹈虚的漫游、隔岸观火的冷漠和故作高深的玄妙,唯有本真性,也只有

本真性,才是生命意义的文学和文学意义的生命共同“在场”的美学立场和审美定位。

在场主义散文所体现的生命特质,是生命的当下性和鲜活性、灵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文学而呈现出来的生命本真性。众所周知,本真性所包含的对真实和真相的揭示、对真知和真理的追求,一直是人类信奉的文化规定和文明守则,也是生活交往的伦理底线和道德标准,更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和最高境界。诚如周闻道在《在场刍议八则》一文里直言的,“抵达本真,让散文性和在场精神拥有了无尽的生命活力”^④。抵达并揭示本真的创作,不仅是生命活力之体现,而且是生命魅力之展现,当然更是生命存在之表现。套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说法——“我”即生命,“在”即在场,那么敞开本真的生命所呈现的一定是“我爱故我在”“我美故我在”和“我写故我在”。这里不论是“爱”也罢,“美”也罢,尤其是“写”也罢,它们是如何体现出生命即“在场”的本真性的呢?

首先是身体的在场。

顾名思义,所谓“在场”即作为个体意义的人亲临现场,其首先也必定是“身临其境”的身体到场,必须有作为物质形态的身体之“我”的存在并亲临,这即身体面向“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就是‘面向事物本身’,就是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⑤,否则,所谓的“在场”将会是子虚乌有。作为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统一内涵的人的“身体”,绝对不只是肉体的堆积和生物的存在,它不但有正常的生命体征,是鲜活的生命个体,而且有正常的生命感觉,是有意识的身体,是能够思维的生命主体,即“身体意识”。对此,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认为:“我所理解的‘身体意识’不仅是心灵对于作为对象的身体的意识,而且也包括‘身体化的意识’:活生生的身体直接

① 孙绍振:《当代散文:流派宣言和学理建构》,《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④⑤ 周闻道主编:《颠覆城堡·理论卷》,第150-151、121、5页。

与世界接触、在世界之内体验它。”^①学者潘端伟说：“这种‘身体意识’实质上就是一种审美的生命状态。”^②身体与世界的接触因此而被人类文明“化”了，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③。身体的在场本质上是一次社会实践活动。美学家高尔泰以《寻找家园》获得2013年在场主义散文奖，其“授奖词”中写道：“他选择了用身体介入残酷的现实，用头颅迎向桎梏的硬墙。”^④他历经了童年逃难的颠沛流离、少年游学的背井离乡、青年受难的九死一生、中年成名后的非议不断，可以说其笔下的每一篇文章都不仅展现出身体对家园的寻找，而且隐含着灵魂对家园的寻找。

在此情景下，具有生命意识的“身体”不可能是人类的集体性共名，而只能是个体的唯一性在场。美学家王晓华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个体哲学》的《个体生存的时间性》一节中论述了“曾在”“将在”“现在”三个概念，指出个体的在世存在，最后收束于死亡的必然降临而使得身体自然退场。当然这个身体消逝的同时，亦有千万个身体不断地诞生。可见，这个身体不仅是鲜活性的物理存在，而且是具有反思性的精神存在，其尽管短暂，依然如帕斯卡尔比喻的，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其次是情感的在场。

仅有有意识的身体的在场，也许是“此身合是诗人未”的形同虚设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身心分离，身体的在场必须是“人到心也到”。这里的“心”，就文学的意义而言，除了意识、思想、灵魂外，更应该是情感，不论是“愤怒出诗人”还是“忧患出诗人”，都指向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七情”。《礼记·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⑤作为与生俱来的情感，“七情”应该属于生理—心理反应，但可以通过文化的熏陶而成为审美意义的情感—精神活动，要进入到审美性的高级情感则需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保证和导向，这就是在场主义提倡的“负载着忧患与苦难”^⑥，其坚决“反对把散文写成风花雪月的补白，权力意志的注解，歌功颂德的谄笑”，而是“躬身触摸生命鲜活的生长状态，而不是在枯尸口里去拔金牙”。^⑦由此说明，情感

的在场不是无病呻吟的伪抒情，而是痛彻心扉的真感情；不是不关痛痒的小资情调，而是担当苦难的家国情怀。独立作家夏榆《黑暗的声音》获得2012年在场主义散文奖，“授奖词”评说他的作品是“用热泪蘸写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期的墓志铭，是二十一世纪初年一段忧郁的光阴挽歌”^⑧。他的笔触直指社会底层洗车工、挖煤工和讨薪的农民工等，发出了无力而无奈的深切悲鸣，再一次反思了自己曾经渴望成为一名“蓝领工人”的感慨。

情感之于生命的意义不仅让身体有血有肉而具有社会性价值，而且使身体有棱有角而充满审美性意义，这是一种切肤之痛，直至痛彻心扉。在场主义非常推崇《楚辞》中的《渔父》，认为其是从忧患中诞生的第一篇散文。诗人和学者周伦佑说：“中国散文源远流长，能够归根到这样沉郁、忧患的源头，是足以让国人自豪的。”^⑨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个体性在场，真乃悲凉时的孤独和孤独中的悲凉，由是赋予在场的情感以深刻的哲思，恰如鲁迅感叹的“梦醒了无路可走”^⑩。

最后是思想的在场。

身陷囹圄的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里发出了“痛定思痛，痛何如哉”^⑪的思索，这说明深

①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中译本序》，《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② 潘端伟：《主体性美育论纲》，第260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

③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第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④ 周闻道主编：《家园志·作品卷》，第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⑤ 刘方元、刘松来、唐满先编著：《十三经直解》（第二卷·下），第347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⑥⑨ 周闻道主编：《颠覆城堡·理论卷》，第19、68页。

⑦ 周闻道：《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代序）》，周闻道编著：《散文：觉醒年代》，第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⑧ 周闻道主编：《黑暗记·作品卷》，第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⑩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⑪ [宋]文天祥著，刘德清、刘菊芳校点：《文天祥全集》，第625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

重而深厚的情感必然走向深刻而深沉的思想,身体在场的思想绝不会是高头讲章的理论、冥思苦想的理念和条分缕析的理性。苏格拉底望着庄严的阿波罗神庙发出了认识你自己的感悟,孔子也反复告诫他的门徒“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①,指出既要感同身受,又要以己度物,只有在场的身体,才能做到情感到位和思想升位。李泽厚曾回忆说,他12岁时陶醉在一片山花烂漫的春意盎然:“突然感到我是要死的,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②正是这次“精神危机”,让他的思想深深地烙上了在场的痕迹,“生命意义、人生意识不是凭空跳出来的”^③。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正确的思想只能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身体力行的参与中引起思考并诞生。为此,在场主义发出了进军的宣言,“我们深信思想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④,可以改变我们对似乎是不刊之论的“先秦散文”和“广义散文”的认识。著名学者金雁的《倒转“红轮”》获得2013年在场主义散文奖,“授奖词”评说她用“这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正是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重新认识近百年来俄苏文学和文化的沉重铁门,其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才是此书最可贵的亮点和看点”^⑤。反思索尔仁尼琴的悲剧,实则是思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保持思想的独立。

周闻道一直倡导“散文的思想”,著名散文研究专家陈剑晖评说他在散文创作中,“总是通过对人生社会的洞察和睿智的思考,来探究笔下的人事,并经常上升到精神和诗的高度”^⑥,进而以此作为在场主义散文创作的引领和评奖的尺度,这仅就前几届获奖作品集的题名就可见一斑:《时光河》《黑暗记》《家园志》《个人史》。借用马克思的说法——“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⑦,这也让散文真正成为散文。

生命的在场不能只是身到的亲临,也不能只为心到的我思,而是要以第一目击者的身份,去除遮蔽,恢复真实。为了实现生命即在场的本真性,我们的思辨从身体到情感再到思想,不仅指出了在场主义之“在场”理念的“历史—逻辑”的本真性,而且呼唤着在场主义之“主义”的“生命—美学”思辨性,进而显示出理论、尤其是美

学理论作为生命之树长青的恒久魅力。

二、美学作为“主义”的理论性

生命与文学有着天然的因缘,文学与审美存在必然的关联,而“在场”就是连结生命、文学、审美的纽带,因为在场意味着生命的亲临,显示着其同文学的亲缘,表明了其与审美的亲在。而当在场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要明白它的创作理念、艺术理趣和审美理想,还得跳出庐山来看庐山、基于文学而高于文学。由此,一种被李泽厚界定的“以美感经验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的学科”^⑧的美学则当仁不让地莅临,并为在场主义提供精神的食粮和理论的武器。

“主义”,顾名思义即主张或主持的义理或道义,指为了某个目标采取的方法,现多指某种理念、信念或思想体系。就文学创作而言,仅有“在场”的意识和觉悟、身位和姿态是不够的,还应将这种自发性、偶然性或不经意的行为变为自为性、经常性或有意识的创作。在场主义一俟登场,在创作还未完全跟上之时,便率先举起“主义”之大旗,于2008年3月8日平地风雷般地发出散文革命的声音:在场主义。这与其说是它诞生的宣言书,不如说是它理论的集结号,更是它展示出的自由精神、超越意识的美学理论构想,即它空前强调了散文创作的在场性、介入性、当下性、发现性的文学意义,重新提出了有关散文的“散文性”的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

① 杨伯峻、杨逢彬译注:《论语》,第13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② 马群林编撰:《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第4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③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2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④ 周闻道主编:《颠覆城堡·理论卷》,第12页。

⑤ 周闻道主编:《家园志·作品卷》,第60页。

⑥ 周闻道编:《介入的力量》,第1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⑦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⑧ 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增订本),第2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性、非体制性文体特征,而且创造性地引入了散文精神、忧患的汉语、现代感应性、审美的现代性的哲学思维。这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场性”内含的身体美学。

如前所述,写作的在场性首要的是写作主体要依次呈现出身体—情感—思想的在场,综合表现为身心一体和灵肉一体的本真性在场,即在当下的介入过程中祛除遮蔽而发现真相,如作为在场主义发起人之一的张生全说的:“强调介入现实,观照当下,勇于担当,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国家、民族、人民的当下疾苦中……”^①在感同身受的体验中,在设身处地的感受中,作家全身心地贴近生活、拥抱时代,正如陈剑晖教授所说的那样,“散文作为一种自由灵动、率性,且特别注重个人体验的文体,最可贵的是创作主体思维方式的独特和对于存在及诗性之思的不懈追求”^②。“在场”因为晋升为“主义”而使得身体的当下性和个体性具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历史性和人类性。周闻道《暂住中国》以“关注当下的痛”为在场写作的立足点,针对城市“暂住人口”及其身无安放而发出的“黑色幽默”,直指这场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悲剧”的身心分离之痛,展现出为身体合法居住而呼吁的现实意义和美学意义,有效地推动了人口迁徙制度由“暂住证”到“居住证”的改革。

在场性的概念理应内含身体美学,或曰身体美学就是对在场性的理性认识。鉴于“艺术家一直深爱身体、崇拜身体、敬畏身体”^③,实用主义哲学家舒斯特曼更多以身体美学研究者的面目出现。他指出,“充满灵性的身体是我们感性欣赏(感觉)和创造性自我提升的场所”,因此“身体美学这个学科既包含理论,又包括实践”。^④我们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将身体置放在特定的场域或场景时,身体即在场,在场即身体,而连接二者或呈现它们的是作为符号艺术的语言。如果说语言是身体的自我表达,^⑤那么“身体将自己投射达到语言中。语言因此具有了‘灵魂’”^⑥。在场的身体借助语言艺术而显现出身体之上的灵魂,即语言所蕴含的意义。如评委在给刘亮程《在新疆》的“授奖词”中写道:“西北农村的现实和生命,在他朴素的口语和没有复合句的语言中,建构起浑然一体的和谐诗意,而

生命的哲理则以一种宁静致远的风度渗透其间。”^⑦

其次是“散文性”包含的文艺美学。

在场主义认为,就像诗歌有诗性、小说有小说性、戏剧有戏剧性一样,散文也应该有“散文性”,“在‘先秦散文’和‘广义散文’的泛指和遮蔽下,中国散文的本体实际上处于隐匿和不在场状态”^⑧。也正是因为散文性的缺失或被忽略,导致其成了四不像的文体。诗歌、小说、戏剧边界清晰,特征鲜明,而散文却形象模糊,包罗万象,这不仅需要文学理论来回答,更需要文艺美学的思考。因为,任何一种文学体裁或种类的属性和性质,都是该文体或种类的本质规定,反映出的是创作对象的丰富性、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表现形式的独特性三者的辩证统一。作家选择哪一种体裁,背后蕴含着他对生活的理解、艺术的表达、审美的偏好等因素,这无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美学工程”,而在场主义连续六次评奖、二十部散文集的出版,以及产生的广泛社会效应,正是对这个工程的文学落实和艺术命名,其所具有的美学意义正如周闻道所言:“任何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创作,都是一次发现,包括对自然、社会、人生、灵魂,对生命本质的独特发现。”^⑨

事实上,有关“文艺美学是研究艺术与艺术活动的审美特性和独特性美学规律的科学”^⑩的说法,在在场主义美学中或已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把文学艺术作为人的一种生命活动来考察,其看重创作主体的生命介入,特别强调“散文性”是散文的审美特性,无论是周闻道等发布的《在场主义宣言》,还是周闻道和周伦佑等在场主义主将,都一致认为“散文性”具有

①②⑨ 周闻道编:《介入的力量》,第78、2、156页。

③④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第2、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⑤ 参见[法]约瑟夫·房德里耶斯:《语言》,岑麒祥、叶蜚声译,第15-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⑥ 王晓华:《身体诗学》,第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⑦ 周闻道编:《家园志·作品卷》,第126页。

⑧ 周闻道主编:《颠覆城堡·理论卷》,第7页。

⑩ 周来祥:《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第4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四个审美特征:摒弃立意在先的“非主题性”,重视片断经验的“非完整性”,倚重发散思维的“非结构性”,推崇自由表达的“非体制性”。这不仅充分体现了“散文性”的文艺美学价值:崇尚自由的潇洒性、弘扬审美的人文性和呈现自我的生命性;而且全面包含了散文应有的生命美学精神——去除遮蔽的本真性、身心到位的在场性和直接介入的纯粹性。

最后是“后现代”蕴含的生命美学。

周闻道认为:“‘散文性’尺度的四大文体特征表现出鲜明的后现代倾向,具备某种天然的后现代性:‘非主题性’对应于‘消解深度’;‘非完整性’对应于‘消解整体’;‘非结构性’对应于‘消解二元对立’;‘非体制性’对应于‘消解中心’。”^①可见,在场主义散文的“散文性”的哲学标志是以现代性为核心概念的“后现代”指向,这已超出文艺范畴建构的美学而进至生命意义追寻的美学。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②这种具有审美意义的现代性主要通过艺术表现出来,它充满着生动而形象的另类与异类、新鲜与新奇、撕裂与断裂的反叛传统的现代性,以满足读者对新鲜刺激、流变动感和瞬间惊艳的心理诉求,无疑有着以审美现代性为内蕴的生命美学意义。在场主义的后现代旨趣多半指向现代人啼笑皆非的生存状态,如沈从文的“老来走红”、高尔泰的“荒诞人生”,以及无数个中国人的“暂住中国”,作家们揭示的是具有审美意义的现代性,即充满反思和批判精神的现代性。

当然,生命美学的定义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明白“生命美学要追问的是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关系即生命的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这一根本问题”^③。文学不仅体现于人类的审美活动,而且表现出人类的生命意义,传统意义的“旧”散文无疑具有审美价值,而在场主义的“新”散文正是在对传统的反叛中探寻现代人类生命存在之意义和如何超越之可能。针对现代人普遍存在的孤独感、异化感、幻灭感、荒诞感、疏离感、隔膜感,在场主义认为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借鉴巴赫金的“复调叙事”、弗洛伊德的“性潜意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的“零度写作”、艾略特的“精神荒原”、贝克特的“人生荒诞”等美学资源,如周伦佑说的,“只有完成这些补课之后,中国白话散文的‘审美现代性’转型才是可以预期的纸上黄金”^④。

美学家高尔泰在为其《寻找家园》获奖而写的“答谢词”中写道:“‘在场’而成为‘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美学,一种创造性的、拓展思维空间和精神维度的导航。”^⑤这是一种以生命为美学精神的导航,由此可抵近“介入—当下性”散文创作的那片洋溢着精神自由的新大陆,因为“精神自由是人性解放的最基本也是最高要求……只有它,才使人真正成为人”^⑥。

三、创作乃“介入”的在场性

何谓“介入”?2019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70页的解释是:“插入其中进行干预。”这进而产生“鲑鱼效应”,打破原来的平衡而引起新的变化。换言之,没有“介入”就没有变革,没有变革就没有进步,就会如一潭死水,最终走向死寂。在场主义的提倡者们就是因为对散文历史和现状的不满,慨然宣布:“‘在场主义’的命名,不是为一群人的写作寻求暂时的总结,而是要为中国散文的未来启动新的开端。”^⑦这股思想清流的介入,必将成为创作的新源头活水。

因散文创作而亮出的在场主义旗号,不仅是一次文学理念的集体发声,也是一种美学理论—生命美学的实践宣言,因其突出“介入”而明确指向散文的创作实践。他们宣称要“以介入——然后在场作为流派的写作方法论建构”^⑧,并“认为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途径是介入”^⑨。介入就是祛除意识形态和知识陈见的遮蔽,促使作家完成精神立场的转变,实现自我人格的建构,彰显主体生命的存在。可见,介入、

①④⑦⑧⑨ 周闻道主编:《颠覆城堡·理论卷》,第25-26、77、2、13、15页。

② [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第439-4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③ 潘知常:《生命美学论稿: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第40页,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⑤ 周闻道主编:《家园志·作品卷》,第5页。

⑥ 周闻道编著:《散文:觉醒年代》,第11页。

在场和创作三个概念有着内在而密切的关联,真正介入才能体现创作的在场,真实在场才能实现介入的创作,真切创作才能表现在场的介入,而连接它们的是充满诗意、富有哲思的鲜活生命。其文学案例,正如对舒婷《灯光转暗,你在何方?》的“授奖词”中所写:“作者在保存记忆的同时,也让自我状态实现。”^①这是自我无遮蔽的真实状态。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在场性创作的“介入”呢?

首先是阐发“介入”的概念。

在场主义因不满于子虚乌有的“先秦散文”和包罗万象的“广义散文”,首先痛陈“中国散文当前的种种乱象,皆是因为对散文本体的遮蔽造成的”^②;接着清理了20世纪西方文学的介入理论,如存在主义作家萨特1945年提出的文学创作的“介入”观,指出他的“介入”是不纯粹的,与政治纠缠不清,较为赞同“原型批评”理论家弗莱“文学是介入的‘大法规’”^③的说法,并十分认同法国新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的纯粹的介入^④。其批判态度是革命性的决绝,直接宣判了非“介入”和非“在场”散文的末日;其批判策略是辩证法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介入理论首先是一种批判理论,在否定和摧毁以往的文学等级观念的同时,进行一种理论的建构”^⑤。

推翻旧世界的目的是建设新世界。在场主义本身禀赋否定性和解构性的后现代性气质,其所崇尚的审美现代性也是以追求价值理性为鹄的,与启蒙现代性以追求工具理性为目的形成鲜明对比,它竭力呼吁“介入意识”,“去除那些制度化语言、意识形态用语、公众意见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遮蔽,使散文之笔直接进入事物内部,与世界的原初经验接触,并通过本真语言呈现出来”^⑥。由此,散文创作既不是自娱自乐的游戏,也不是无病呻吟的自恋,而是为“揭示出‘真实’‘真相’和‘真理’”^⑦。在场主义倡导没有政治说教和社会规训的“纯粹的介入”,以话语的力量实现“自由的否定性与自由的建构性的统一”^⑧。由此说明,介入不但具有文学的在场现实性意义,而且有着美学的自由本体论价值。周闻道的创作即及时介入了当代中国

有关国计民生等的重大问题,如有关户籍制度改革《暂住中国》,关乎大型国企重组的《重装突围》和《国企变法录》,探讨现代人情感与距离的散文集《红尘距离》等。

其次是提出“介入”的种类。

就一般意义而言,创作和劳作、审美和审视、思考和反思都可视为意识或身体或身心一体的“介入”,当然其整体上都是人类生命的介入。由于“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此所有的介入都如“每一天升起的新太阳”。介入即实践,介入即创造,在场性的介入即真实性的实践和创新性的变革,可见没有介入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个体生命的成长。面对介入的本体论地位和介入的广泛性存在,在场主义的“‘在场散文’所主张的介入包括:对作家主体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介入”^⑨。这三个方面的介入,早已超出了仅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对生活和对对象的介入。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对作家主体的介入”。作家是在场主义的第一发起人和创作施动者,只有他的介入才能推动整个文学的介入,完成思想的去蔽——“这里的去蔽,首先指向作家主体,通过介入,使作家完成精神与写作立场的转变”^⑩,进而在这场文学革命中坚定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散文精神。二是“对当下的介入”,即作家全身心地贴近和拥抱正在经历的生活和所处的时代,“介入的重点是当下现实,对民众和人民当下宏大叙事的关怀,超过任何无病呻吟的个人情绪宣泄”^⑪。也只有真诚地介入当下,才能做到真正的在场,并使得作家主体和现实客体形成“介入”的呼应和共鸣。三是“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介入”。按照在场主义的理解,作家

① 周闻道主编:《文人事: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选》,第15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②⑤⑥⑦⑧⑨⑩⑪ 周闻道主编:《颠覆城堡·理论卷》,第3、10-11、16、11、10、14、16、112-113页。

③ [法]维茨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王东亮、王晨阳译,第1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④ 参见[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的创作是以个体的方式对当下人类生活的审美介入,这看似个体,实则是以人类的二重性身份介入当下,所谓“天下忧乐系于身”“心事浩茫连广宇”,因此他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以晚年沈从文再度爆红文坛为叙事切入,不但回顾了他一生的辛苦遭逢,而且写出了热闹的文学界与他的冷寂的鲜明对比,特别是他逝世后有关方面“三缄其口”,进而引出深思。

最后是彰显“介入”的力量。

2023年《介入的力量》的出版,充分说明在场主义十余年耕耘文坛已成绩斐然,作为创始人和主力军的周闻道出版了近十部散文集,充分展示出了在场主义“介入”的力量。散文理论家陈剑晖教授以周闻道的《七城书》为例,认为他的创作“给散文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和社会担当,让散文富有了更坚实的美学价值”^①。邓芳副教授从他的《对岸》中读出了“只有对心灵世界进行深度挖掘,散文创作才能自救,也能救人”^②。著名作家傅恒为他的散文集《点击心灵》作序,序言题目即为《在诗意中展示个性思考》。^③作家兼评论家李伯勇认为他的《暂住中国》《国企变法录》《重装突围》这类重大题材和《红尘距离》等小我叙事的散文,“既具有社会生活的广度,也有着个人心灵的深度”^④。

为彰显文学或作家介入的力量,在场主义特别推崇那些在公共事务领域具有思想的独立性、精神的批判性和价值的普适性的专业人士,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著名学者丁帆指出:“我们提倡‘在场’,而在许许多多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缺席’的。”^⑤欣慰的是,在周闻道、周伦佑等的大力倡导和呼吁下,作为作家的中国知识分子勇敢地“在场”并坚决地“介入”,仅以在场主义散文奖五年之际推出的获奖作品集《黑暗记》中三位作家的创作为例,就可见介入力量的四两千斤。夏榆通过为社会“底层”代言,认识到“写作是对个人最后场所的加固,也是对人性的最后捍卫”^⑥。冯秋子通过对人类“土地”的讴歌,发现了“唯有思想自由,方可能达至大美境界”^⑦。著名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的《不尽之思》正如其“授奖词”所指出的:“体现了一种回归自我和文明

常识的人生示范。”^⑧当然,文学介入的力量不能与政府和组织的介入力量相提并论,如果说后者显示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前者潜藏的就是“绵里藏针”的效能,它不但深刻地开启批判和反思的精神,而且持续地产生启迪和引领的能量。

也许“在场”最终也会“退场”,其实“介入”更是为了“推动”,其中蕴含着“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⑨的悲壮与崇高。对于以周闻道为代表的众多作家而言,在场即介入即创作,由此不但形成了在场主义追求散文性的文学观,而且体现出在场主义崇尚生命力的美学观。这就是丁帆赞赏的:“独立的价值判断是引导整个文学、整个文学史走向的灵魂。”^⑩

结语:“生命美学”给出的理解

众所周知,2008年兴起的在场主义散文写作,已取得不俗的成绩和产生较大的影响,虽然学术界已从文学理论上予以初步的阐释,但有个问题依然萦绕其中,挥之不去,那就是在场主义有着广泛的文学艺术针对性,但为何钟情于散文?这是一个还未曾涉及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不必说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也不必说灿若星汉的中外作家,仅就文学体裁通常划分的四种类型——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而言,尽管在场主义理论适用于所有的文学和艺术类型,但它为何格外钟情于散文?要解释其中的奥秘,仅从文学理论入手,从四大体裁的表现形式上寻求答案是不够的;仅从艺术原理入手,从语言审美的表现内容里寻找解答也是不够的,其还需要从生命美学入手,从精神自由的维度上予以考察,如周闻道所言:“在场是精神自由的必然要求。我理解,所谓精神自由,主要指人的精神活动在法的空间里的无拘无束,自在而为,

①②③④ 周闻道编:《介入的力量》,第8、34、35、109页。

⑤⑩ 丁帆:《在场主义的批判精神引导文学走向(代序)》,周闻道主编:《文人事: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选》,第3、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⑥⑦⑧ 周闻道主编:《黑暗记·作品卷》,第14、109、212页。

⑨ 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第4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接近本真的过程。”^①精神自由,不仅是文学艺术的主题指向,而且是在场散文的美学方向,揭示的是由在场个体的“我”与生活世界构成的文学世界的意义。

从文体的角度,通过将散文与诗歌、戏剧、小说相比较,我们欣喜地发现并领略着“在场散文”的独特性和审美性。如果说诗歌侧重于时间性、戏剧偏重于空间性、小说呈现出时空交织的一体性,那么散文则由于集叙事、描写、抒情、议论于一身而位于这个时空坐标的原点,并因其对“散文性”的开掘而放射出生命美学的熠熠光芒,恰如笔者曾指出的:

文学是人学,是人的生命的感性存在,美学尤其是生命美学更是以生命意义的探询为其崇高使命,前者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而存在,而后者却以抽象思维的方式而存在;也正是因为有了文学创作的体验和经历,方能在美学研究中更能体察和体会、感知和感悟到生命的独特魅力。^②

这也是在场主义所推崇的“散文精神”:

作家以散文这种独有的文体形式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涵养、观照与表达,它包括主体精神与本体精神两部分……散文作家的主体精神建构包括: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介入的道德勇气、自觉的文体变构意识,以及对散文写作的专注感、自豪感、使命感和价值感。散文的文体精神包括“文统意识”“文本意识”和“文体意识”。^③

文学是人的生命意义的审美表现,在场主

义之所以青睐散文或散文最能契合在场主义的精神,是因为散文所特有的“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都只是精神存在的外壳”^④。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任何形式都是呈现内容的独特方式,“有意味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这也是包括周闻道、周伦佑等在内的作家们一直追求的:“在场写作的精神,以作家‘个人的立场’,关注‘共同的命运’为存在方式,是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对真实人性的剥露,对生命终极价值的关怀,对人类‘终极家园’的精神诉求,对生存与存在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⑤

由此可见,负有振衰起弊使命而横空出世的在场主义散文,既是生命的“在场”,也是美学的“主义”,更是在场主义与生命美学的一次饱含激情、内含智慧和蕴含思想的高端对话,其阐发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散文精神就是作家个体以散文这种独有的文体形式对人类自由精神的表现。”^⑥这不仅表现出作家在场、介入、敞亮的“自由生命精神”,而且彰显了人类求真、向善、爱美的“自由生命追求”。正如高尔泰的美学名言所指出的:美是自由的象征!^⑦

【作者简介】范藻,四川文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生命美学、艺术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④⑤ 周闻道编著:《散文:觉醒年代》,第10、4、4页。

② 范藻:《爱与美的交响:潘知常生命美学研究》,第356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

③⑥ 周闻道主编:《颠覆城堡·理论卷》,第16-17、71页。

⑦ 参见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